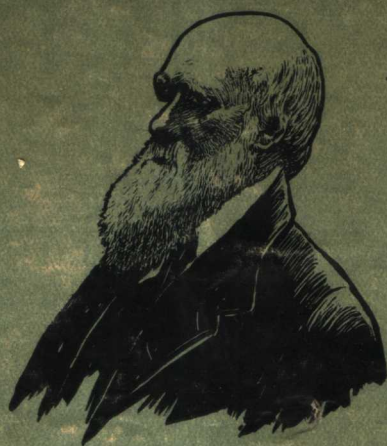




查 理 士 · 达 尔 文 和 在 貝 格 尔 艦 上 的 旅 行

達 爾 文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查 理 士 · 达 尔 文 和 在 貝 格 尔 艦 上 的 旅 行

(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期間裡的家信集和筆記本)

[英]查理士·達爾文 原著

[英]諾拉·芭洛 編輯和作序言

[蘇]С. Л. 索波里 作序文和附註

周 邦 立 譯

科 學 出 版 社

1 9 5 8

查理士·達爾文和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

(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期間裡的家信集和筆記本)

原著者	〔英〕達爾文
翻譯者	周邦立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8年4月第一版 書號 1089 字數：319,000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8

(京) 0001—1,660 印張：17 4/9 插頁：5

定價：(10) 3.40 元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1945,
BY PILOT PRESS LTD., 45 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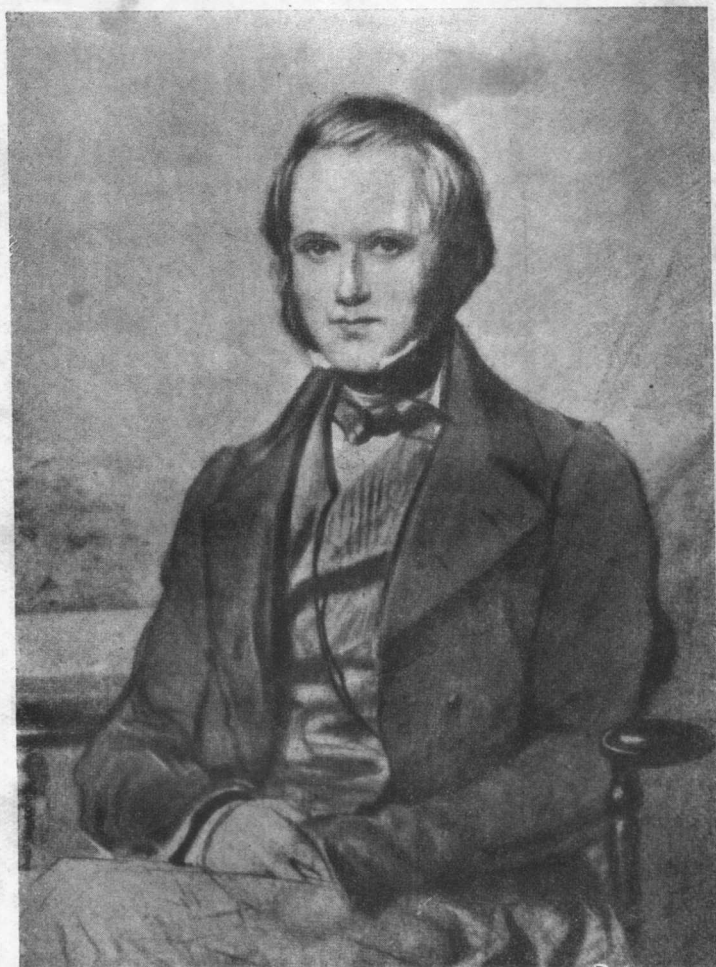
This book is printed in complete
conformity with the authorized economy
standard.

Printed at THE CHISWICK PRESS, London, N.11,
by EYRE & SPOTTISWOODE, LTD.

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ora Barlow
Pilot Press Ltd. London, 1945.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在1945年第一次由查理士·達爾文的孫女諾拉·芭洛編輯出版。內容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原書編者所撰寫，敘述查理士·達爾文的家庭環境，幼年和青年時的生活情況和接受建議去擔任貝格爾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的經過情形以及艦長費支羅伊的性格等。第二部分是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期間裡寫給家中姊妹和父親的信，講述他的生活和考察旅行的情形，並且流露出他對家庭間的濃厚的情感以及對奴隸制度與殘殺土人等社會不平現象的意見。第三部分是達爾文的筆記本；這是他在考察旅行時隨身攜帶和隨地記寫的原始資料，裡面含有一些過去大家所未知道的關於物種和地質問題等的意見。從這本書裡，可以閱讀到達爾文對科學研究的艱苦奮鬥的作風和他的科學思想的發展與變化的情況。譯者又研看了這本書的俄譯本，加譯了俄譯本編者索波里教授的序文和附註，增加了一些插圖，以便使大家更加能夠了解這本書的內容。



28歲時候的查理士·達爾文。

——李奇蒙德繪。



查理士·達爾文和他的妹妹卡薩琳·達爾文, 1816年。

譯者前言

查理士·達爾文和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這本書，是在1945年第一次由諾拉·芭洛(Nora Barlow)編輯出版。這本書裡所收編的書信和筆記本，就是達爾文在環球旅行時期裡所寫的最早的資料。這些資料可以使我們確切了解到達爾文的進化思想的開始和發展經過，同時也可以知道當時他所遇到的一些不能正式發表的情形。尤其是在閱讀到他的書信的時候，讀者們就會感到達爾文對家庭的感情是多麼的濃厚，他一定是自己家中的快樂的泉源。

譯者按照英文原本翻譯了這本書；在翻譯將要結束的時候，呂為俊同志在莫斯科代為採購到了它的俄文譯本，因此譯者能够再作了一次對照修改，並且添加了一些俄文本譯者馬涅維奇(Э. Н. Маневич)和俄文本編者索波里(С. Л. Соболев)教授所寫的附註；同時又加譯了索波里教授對俄譯本的序文，這樣就可以使我國讀者們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這本書的內容。俄文譯本並沒有把諾拉·芭洛所寫的序文和第一部分譯出；這是因為在蘇聯的其他的書籍裡已經有過這一類介紹文章的緣故，但是在我國則還是很少看到這種介紹文字，所以譯者認為仍舊有把它們發表的價值；如果把它們割除去，則未免減少了一些研究原著的輔助資料，也可能會減少讀者們的興趣。俄文譯本的書名也更改為：在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書信和筆記本(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письма и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參看後面的插頁)。當然我們可以看出，諾拉·芭洛局限於她的思想和觀點，因此有些地方對達爾文的性格描寫和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

現在這本書裡所附的插圖和地圖，是從英文原本和俄文譯本裡採取來的。在達爾文所著的另一本著作——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A Naturalist'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H. M. S. ‘Beagle’，科學出版社，1957年)裡面，附有幾幅更加詳細的地圖；讀者們可以去查閱它們；這本書也是譯者所譯，所以現在這本書裡的地名和人名也和它統一了起來。

因為諾拉·芭洛和索波里教授已經對這本書介紹得相當詳細，所以譯者不再在這裡多說了。

最後，還希望讀者和專家們幫助，提出一些有關譯文方面的缺點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時候修正。

中文譯者寫於1957年3月。

本書俄譯本的序文

C. A. 索波里教授

達爾文的科學遺產，還決沒有被研究清楚。大家知道，除了已經發表的達爾文的著作和信件以外，在他的科學文獻裡面，含有大量的日記、備考、沒有發表的資料、初步擬寫的草稿、他的藏書的書頁空白處的批註、信件等。顯然無疑，這些資料對於進化學說史的了解方面具有重大意義；在把它們介紹出來以後，就一定可以揭露出達爾文的進化思想的起源，並且查明達爾文主義的鬭爭史的很多還沒有被人知道的要點。

可是，達爾文的科學文獻在不久以前差不多還沒有被人研究過，因為它們是達爾文一族裡的很多人的私有財產。只有在1942年，方才有大多數藏有達爾文的資料的所有主，把它們轉讓給劍橋大學和達溫 (Down) 地方的達爾文紀念館。¹⁾ 現在還沒有人知道，關於這位天才的生物學家的沒有發表的遺產在英國的學術研究，究竟已經進行到怎樣的程度。到現在為止，已經發表的唯一的文獻，就是由達爾文的孫女諾拉·芭洛所編輯的部分；諾拉·芭洛憑着自己的天才，來進行了有關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方面的文獻的研究工作。

1933年，諾拉·芭洛出版了達爾文的旅行日記 (Diary)；這本旅行日記，是達爾文在旅行期間裡所寫的，也就是後來他所發表的世界聞名的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的基礎稿本。²⁾ 1935年，她在自然雜誌 (Nature, 第3436期, 9月7日) 裡面，發表了達爾文關於加拉巴 哥斯群島的雀科鳴禽方面的動物學筆記草稿裡的特別重要而有興趣的片斷。³⁾ 最後，在1945年，她又出版了一本不厚的書；這本書的譯文 (就是現在的俄譯本)，也應該受到蘇聯讀者的重視。在這本書裡面，

1) 參看自然雜誌 (Nature), 1942年, 第3810期, 第535頁; 又參看伊林斯基 (А. П. Ильинский) 的報告文章: 自然雜誌 (Природа), 1943年, 第4期, 第87—89頁。——原註。

2) 旅行日記的最主要的部分的俄譯文，已經發表在我編輯的達爾文全集的第1卷裡面 (生物學和醫學書籍出版社, 莫斯科-列寧格勒, 1935年, 第423—564頁)，並且也發表在這一卷的單行本裡面 (也是第423—564頁)，這個單行本的名稱是: 查理士·達爾文，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 (Ч. Дарви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туралиста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 蘇聯科學院出版社, 莫斯科-列寧格勒, 1941年。——原註。

3) 同上註所說的俄文譯本, 第586—587頁。——原註。

收編了達爾文在旅行途中寄給自己家裡的人們的信件38封(這當中有28封信,以前從來沒有被發表過)和筆記本; 達爾文就在旅行所達到的地點,當時就把自己的觀察和印象粗略和簡短地記寫在這些筆記本裡,以便在比較安靜的時候,在軍艦上和在地上的住宿地方,再把這些筆記草稿展開,成為更加詳細的筆記——旅行日記。

諾拉·芭洛所發表的文獻,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們的價值,不僅是在於它們可以使人去研究作為自然科學家的年青的達爾文的思想形成過程的所有細節。在他的信件裡,主要是在他的筆記裡,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痕跡,表明出達爾文隨着旅行的展開和地質學與生物學的觀察資料的積累,逐漸地克服了他已經獲得的關於物種不變和被上帝創造的信仰,並且在事實的壓力之下,接近於進化觀點。

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這本書,在1839年首先被達爾文發表出來。這本書原來叫做地質學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記,在初版時候,被編進在凱恩(King)和費支羅伊(Fitz-Roy)兩艦長關於阿德文丘和貝格爾兩艦在1828—1830和1831—1836年間的航行記的三卷集裡面。1845年,達爾文第二次單獨出版了自己的旅行記,並且把這本書改寫得具有更加通俗的性質。大家清楚地知道,在這兩個版本裡,達爾文細心地掩藏去了自己的進化觀點。因為這本書在1839年出版,那時候達爾文還沒有把自己的觀點整理成為一個相當嚴整的體系,所以我們也不應該對這件事情表示驚奇。可是,1845年的版本,已經是在達爾文寫成了自然選擇學說的初步概述以後出版(這篇概述文章在1842年發表時候是比較節縮的,而在1844年則被擴展了),而在這本書裡,達爾文仍舊抱着他所特有的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並沒有對於他所記述的生物學現象作出直接的進化觀點的解釋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些現象正是直接啓發他獲得進化思想的;同時,在這本書的各處地方,還保留着那些關於物種不變和被上帝創造的學說(神造論)所特有的術語和文句,不過在他看來,它們已經失却了任何意義。

自然可以知道,在1859年以後,凡是已經知道達爾文學說的讀者,就能够在閱讀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的時候,也可以發現達爾文在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的導言的最初幾句話裡面所引用的觀察資料和他在討論進化學說的各個不同的問題時候所採用的很多其他資料,還有個別的對於物種的神造論的正確性發生懷疑的極其小心地寫成的句子¹⁾。

1) 如果要知道關於這方面的更加詳細的情形,那麼可以參看我寫的文章: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考察情形(Экспедиция Ч. Дарвина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е")。載在達爾文全集第1卷裡(生物學和醫學書籍出版社,莫斯科-列寧格勒,1935年,第13—47頁)。讀者也可以在這篇文章裡閱讀到那些有關達爾文的旅行方面的經過詳情。——原註。

諾拉·芭洛所發表的達爾文的原稿資料，尤其使我們感到興趣。這些資料向讀者們暴露出了達爾文的觀點早在這次旅行期間裡，就已經明顯地向進化論方面轉變。達爾文在1835年9月居住在加拉巴哥斯群島上，並且作了這個群島的雀科鳴禽的備考；當時他寫道：“要是會對於這些[關於雀科鳴禽和陸龜在加拉巴哥斯群島的各個不同島嶼上的種的變異的]意見得出縱然是極小的理由來，那麼這個群島上的動物真是非常值得加以研究的了，因為這類事實會得摧毀物種不變[的信仰]。”¹⁾

另外還有一段卓越的筆記，沒有在已經出版的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裡發表出來；我們可以在旅行日記裡的1836年1月17—19日的記述裡找到它。達爾文在判斷澳大利亞的動物區系的特點和蟻獅(ant-lion)的幼蟲的特徵時候(這種蟻獅和歐洲蟻獅屬於同一個屬，但不是同一個種)，就提出一個問題道，在世界上彼此相隔有這樣遙遠的地區裡面，究竟怎樣會發生彼此互相接近而同時又有差異的類型出來的呢？他就用半帶幽默的語調來說道，爲了說明這種事實起見，在這裡就必須去假定說：這些彼此互相接近而同時又有差異的類型，或者可能是被兩個不同的創世主所創造出來的，或者是被一個創世主所創造出來，但是他“在他工作的時候曾經休息過”，因此就在不同的地質時期裡面創造出了一些彼此相似而又有差異的變型來了。換句話說，達爾文好像不得不去承認聖經上關於上帝創造物種的教義本身發生了矛盾，它已經不可能去說明那個在實際上被觀察到的生物學現象的全部總體了。

在把這兩段引用文字來作比較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在1835年9月到1836年1月這個期間裡，達爾文已經獨自形成了兩個概念：(1)那些被觀察到的事實在摧毀物種不變的信仰；(2)那些想用神造論方法來解釋自然界的同一地點的不同的、但是有明顯的親系關係的物種的起源的企圖，是荒謬無理的。

在諾拉·芭洛發表剛才所考察到的文獻以前，弗蘭西斯·達爾文(Francis Darwin)在1887年曾經發表了一些從達爾文的著名的筆記本裡摘錄來的1837—1838年間的筆記片斷；可以認爲，這些片斷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達爾文關於進化問題的所有意見當中的最早的意見²⁾。在把這些片斷去和上面所舉出的引用文字作比較以後，就可以知道，達爾文的思想到上面所說的時候已經有相當的成熟。有一段筆記

1) 這裡的長體字是作者(索波里)所改用的。——原註。〔參看後面第259頁。——中譯者註。〕

2) 這些片斷的譯文，已經被發表在達爾文全集第3卷裡(蘇聯科學院出版社，莫斯科—列寧格勒，1939年，第75—78頁)。關於達爾文的筆記本，也可以參看涅克拉索夫(А. Д. Некрасов)和我所寫的文章(第27—30頁和第763—765頁)。——原註。

特別使人注意；達爾文在這段筆記講到居住條件、絕滅、變異和適應之間的相互關係道：“至於說到絕滅，那麼我們就容易看到，駝鳥的變種 (Petise) 可以表現出很難適應的情形來，因此就會死亡；或者從另一方面看來，……處在順利條件下的時候，就旺盛地繁殖起來。有一個原理成為這種情形的基礎，就是：那些被有限的地界裡的繁殖和變化着的條件所引起的經常變異，繼續存在着，並且依照着那種對於這些條件的適應情形而發展下去，因此物種的絕滅正就是對環境不能適應的後果。”

達爾文在這段筆記裡，已經相當明顯地發表出了適者生存和不適者絕滅的情形是由於“有限的地界裡的繁殖”和生存條件的變化而發生的見解；它的記寫日期，不會得遲於 1838 年 2 月，就是在達爾文閱讀到馬爾薩斯的學說以前。這使達爾文的兒子弗蘭西斯有根據去十分正確地聲明道：“我確實無疑地認為，……他的經驗即使沒有馬爾薩斯的幫助，也會精煉成為理論，而‘可以用這個理論來進行研究工作’。”

現在這本書裡所翻譯出來的筆記本，還可以使我們發現達爾文的進化觀念的發展裡面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在這些筆記本當中，最後的一本有時仍舊被達爾文利用，直到 1839 年為止；在這本筆記本裡，含有許多極重要的筆記；根據諾拉·芭洛的推測，這些筆記是“在他的五年旅行的最後期間裡，在回返英格蘭的途中”所寫的。我們可以完全同意諾拉·芭洛的推測，因為在把達爾文從 1837 年 7 月到 1838 年 2 月間所寫的筆記本來作比較的時候，這些筆記就顯得不明確得多，並且證明它們是在達爾文還沒有完全放棄神造論的時期裡所寫的。

在這裡，達爾文已經十分明確地肯定了相近物種的發生方面的聯系：“普通駝鳥和小種駝鳥 Petise [達爾文駝鳥] 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有已經絕滅的羊駝的幾個不同品種和現代羊駝品種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具有同樣的規律。在第一種情形裡，可以用空間來確定它們的關係；而在第二種情形裡，則可以用時間來確定它們的關係（就是變異應該通過相當的時間）；因為在第一種情形裡，不同的物種是接合的〔形成連續不斷的系列〕，所以我們應該相信古代物種也是這樣的。”*物種的這種親系關係受到繁殖現象的制約：“不管繁殖是不是普通的、雌雄同體的（гермафродитное размножение），或者用分裂方法使一個動物變成兩個……，在繁殖的時候，我們總是看到個體：它或者是在某一個時刻被分裂出來，或者是在幾世紀的長時間裡被分裂出來”。因此，提出下面的問題來是十分合理的：“在認識了 *Avestruz* [*Petise*，或者達爾文駝鳥（нанду Дарвина）] 的時候，就會明白，這兩個種顯然

* 參看後面第三部分的第五章，第 280 頁。——中譯者註。

是不同的，具有很顯著的差異。爲什麼他們會引起我們去找尋共同的祖先的呢？爲什麼在同一處地方會出現兩個在親系上最接近的種呢？”

1836年，當達爾文獨自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他還沒得出上面所舉出的那個在1837—1838年的筆記裡被他所定出的觀念來。他還是一心一意地企圖去理解進化發展的規律性，同時沒有完全放棄神造論：“有一個見解在誘引着我，就是動物在一定的期間裡面被創造出來；它們並不會由於環境的變化而被消滅。”大概達爾文只有在逐漸消除去自己的神造論觀念以後，方才想要用這種方法去找出神造論和進化觀念之間的調和見解來；在那個時候，他已經不能夠放棄進化觀念了。“創造的力量”竟“在更大的地區（澳大利亞）裡”和“在火山島上面”，並且“在這一些小地點或者在任何一座山上”，都創造出了各種不同的特有的類型來。……“可是，那些新被創造出來的類型，仍舊要受到隣近的大陸的依照圓周而擴展的影響，好像一定地區裡的任何類型的創造應該具有自己的特殊的特徵。”在達爾文的這些字句裡面，表現出了一種深刻不滿的苦痛感覺來；當時的矛盾的一方面，是他明顯地理解到的那些居住在一個共同地區裡的類型的親系關係，而另一方面則是創造這些類型的“創世主”的“古怪的”活動；可是，達爾文却還沒有從這個矛盾裡面發現一條出路。

就在這個1836年裡，達爾文企圖構成一個調和神造論和進化論的“理論”。有一點極可作爲特徵，就是自然選擇理論的將來的創立人達爾文，就在那條預料到……20世紀的反動的生物學家們的自生論所走的道路上面，發現了這種“調和”。他寫道：“並不是在環境（Circumstances）的影響下的逐漸的變異或者退化；如果一個物種轉變成爲另一個物種，那麼這種情形應該用飛躍的方式來發生，否則物種可能會被消滅。這個關於物種的觀念是重要的，……連續性的本身並沒有顯露出程序來。”因此，在這裡，“上帝創造”的行動就被一種同樣奇妙的“飛躍”所代替，而這種“飛躍”是在沒有任何的事先的準備、沒有因環境（“情況”）而發生的漸變的情形下發生的。

自然可以明白，我們不能夠把達爾文的“飛躍”去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飛躍觀念混爲一談。這並不是列寧主義的“漸進性的中斷”（“……自然界裡的生命和發展，也包括着緩慢的進化和迅速的飛躍、漸進性的中斷”（列寧全集，第3版，第15卷，第7頁）），而倒不如說是德弗利茲（De Vries）所提出的突變（мутация）。可是，如果資產階級的神造論的復辟者們，在他們和達爾文主義所進行的明爭暗鬥裡面，在物種起源一書出版了50年以後，也去採取突然飛躍的“理論”的話，那麼年青的達爾文總共只需要1年的時間，就已經認識到自己的思想錯誤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知道，在1837—1838年裡面，達爾文已經能够清除自己的動搖心理。我們在上面已經舉出了他在回返英國的途中所寫的筆記片斷；就在這本記寫這些片斷的筆記本裡，包括着一些更加晚的、大概是在1838—1839年裡面所寫的筆記。這些筆記的肯定的、老練的語調，正表明出他的動搖心理已經停止，而收集物種不變的資料的工作則已經開始了。達爾文寫道：“某些變異的法則、情況，應該永遠不會引起變種出現，”並且接下去又向自己提出一個任務道：“無論如何要去查明：變異會不會引起一定的屬內的具有種的意義的特徵出現。”我們就在這裡發現許多下列的筆記：各種人對於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種和品種的變異問題的意見，種間雜交和獲得雜種的可能性，鴿的歷史等。

上面已經舉出的一批引用句子，已經足够使人承認說，諾拉·芭洛所發表的文獻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可是，除此以外，年青的達爾文所寫的筆記本和書信，對於深入研究這位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的科學活動的傳記方面，也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些筆記的斷片性質，就使人認為它們有時很難了解。可是，在把它們去和達爾文的已經作過文句上的加工的著作對照閱讀的時候，這些備考和書信的直接、坦白的說明，就可以使人看清楚達爾文的真意，探查出他的科學研究的發展過程。凡是已經清楚地認識考察日記和旅行日記的讀者，就可以在很多筆記裡，看出許多事實和觀察的濃縮的記述，而這些事實和觀察在這兩本書裡就被詳細地敘述出來；同時還可以看到達爾文關於下面幾點的基本見解的未成熟的定義：大陸的上升和下降，山脈和珊瑚島的起源，已經絕滅的類型和現代類型之間的相互關係，島嶼的和大陸的動物區系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可是，他同時也暴露出了許多幼稚的說法，不過達爾文還在旅行期間裡，在繼續下去的研究工作過程裡，就放棄了這些說法。在這些筆記裡，含有着不少有關科學的和政治的問題方面的坦白的、而且時常是相當直接的、尖銳的意見，而達爾文在自己所發表的著作裡，就把它們或者寫得溫和了一些，或者是完全刪略去了。

在評斷後面這些情形的時候，應該了解到，達爾文是一個出身於英國資產階級的環境裡，這個環境具有着自由主義的特徵；這種自由主義是和那種對於英國的強盛的威力和文化發生狂喜和崇拜結合在一起的。達爾文是擁護民權黨的人；在上世紀的30年代裡，民權黨以工人階級作為支柱，取得了對地主和財閥的暫時的勝利，並且構成了反動的保守黨的基本核心。因此，可以知道，達爾文痛恨奴隸制度，同情黑人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的遭遇，他們爲了爭取獨立而反抗西班牙的殖民者們而作着英勇的鬭爭；而殖民者們的盜匪式軍隊就以大農場主、殘忍的羅薩斯將軍

作為首腦。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對於慘無人道的、因此從英國企業主的觀點看來是已經不經濟的、不合理的剝削無產階級化的智利農民的情況，採取了顯著的否定態度。例如，達爾文斷定說：“土人的人數在迅速減少下去，”“只要是在歐洲人所達到的任何地方，死神就好像在迫害着當地的居民們。”¹⁾可是，同時在達爾文所寫的信件和筆記本的字句裡，多次對於“不列顛的國旗”閃現出狂喜來；好像在世界的最遙遠的地點，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新西蘭，在這面國旗的周圍就會產生出“財富、繁榮和文明來。”²⁾達爾文甚至還不能夠看出，貝格爾艦實際上是不列顛海軍部的一艘偵察艦，而海軍部的水路學家、艦長貝福特 (Capt. Beaufort) 在他的備忘錄裡，却用下面的話來規定了貝格爾艦的任務說：“考察隊要針對於最崇高的目的：獲取知識”，——這句話只不過是一個用來掩飾英國資產階級的兇殘企圖的幌子罷了。他們在貝格爾艦上所做的測量工作和編製各個當時還沒有十分明瞭的地區的準確的航海地圖的工作，正就是為了開拓英國的軍事進攻和商業擴張的路綫所必需的。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就是英國海軍部却並沒有花費一文錢去作為貝格爾艦上的自然科學家的研究費用，同時達爾文不僅沒有得到任何的薪俸，不僅要支用自己的錢去購置科學研究的設備、包裝和寄遞他所採集到的標本等，而且還要付出自己在軍艦上的伙食費給海軍部。英國政府就是這樣來實現了考察隊的“最崇高的目的”，就是這樣來促進了“獲取知識”。

在這本書的譯本裡，編者認為，可以把諾拉·芭洛的緒論文章部分略去，並且把她的很多說明部分節縮*。諾拉·芭洛用天真的語調來寫作的緒論文章，主要是談到達爾文一家人在希留布里 (Shrewsbury) 的家中的日常的生活情形、描寫達爾文的姊妹們的性格等；這些事情對於蘇聯的讀者說來是興趣不大的。凡是閱讀過達爾文自傳的人，就已經清楚地知道諾拉·芭洛在這裡所舉出的傳記情節，而她在旅行日記的序文裡也講到了達爾文被邀請到貝格爾艦上去的一段情形了。

達爾文的原著的俄譯文，尤其是他的筆記本的譯文，由於原文極其簡略、沒有文章上的句段，不按照語法，而且有時還有用詞錯誤的情形，所以很難表達出來；在

1) 達爾文全集，生物學和醫學書籍出版社，1935年，第362、364頁。——原註。

2) 如果要更加詳細地知道關於年青的達爾文的社會政治觀點和貝格爾艦的真正的考察任務方面的情形，那麼可以參看我在達爾文全集第1卷裡所寫的文章：達爾文在貝格爾艦上的考察情形。——原註。

* 在中譯本裡，譯者主要是按照諾拉·芭洛的說明文字翻譯的，但是在有些不太透澈和不明顯的地方，則參照俄譯本的修改和補充的句子來譯寫。當然，有些地方說明得似乎太囉嗦了一些。——中譯者註。

有些個別情況裡，甚至很難使人理解到他的用詞和句子意義之間的聯系。這個原因，一部分也是由於諾拉·芭洛時常不能夠辨認清楚達爾文的筆跡，並且顯然她把個別的字看錯了。由於原稿缺乏明顯的標點符號，時常略去一些字，所以在別人看來，只能夠勉強領會到一些暗示罷了。俄譯本的譯者和編者設法儘可能正確地轉達出達爾文的原稿文字來。如果對它採取“譯解”的方式，那麼恐怕就只會曲解了它的原意。在達爾文的原文的內部的有些地方，由諾拉·芭洛、俄文本的譯者或編者添加了一些爲了理解它所必需的個別的字或者句子。這些字（或者句子）都被排印在方括號裡面。^{*}

C. 索波里

^{*} 在中譯本裡面，譯者也參照了達爾文所著的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就是考察日記，中譯本，科學出版社）和旅行日記（英文原本），添加了一些字在方括號裡，並且寫了一些附註。——中譯者註。

原書編者的序文

諾拉·芭洛

“貝格爾艦上的旅行，是我一生當中的最重大的事件，並且決定了我的全部研究事業。”

在查理士·達爾文的晚年，當他回顧到差不多50年平靜的家居生活以前的自己的青年時代所幹的光榮的冒險事業的時候，他就寫下了上面這一句話；那時候，他正是22歲的青年，乘坐着一隻帆船式軍艦，在作着環球旅行；這一次旅行，就使他的名字到處傳揚開來。

英國海軍部給予貝格爾艦的艦長羅勃特·費支羅伊 (Robert Fitz Roy) 的訓令是可以使人理解的；這些訓令指出了這次航行探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準備去測量南美洲的南部沿海一帶的航綫，同時還要去做到環繞地球的各地的一系列的時計測定工作。除此以外，還要去很多附屬的工作，例如：測定所有顯著的海岬的方位角，繪製貝格爾艦所到達的地方的地圖。費支羅伊在上一次測量航行的時候，曾經在南美洲度過了幾年，所以他已經對南美洲的南部地區的情形很熟悉，而且也已經感覺到，需要有一個精通科學知識的人去估定這一帶地方的將來的礦物學上的價值。他對於促進第二次航行探險的成功的一番熱心，使他接近於水文學家*的意見，允許在貝格爾艦的人員名冊裡面，列進一個具備這種輔助知識的人，作為自己的客人；這個客人在遇到軍艦所訪問的遙遠的、情況不明的、難以通行的地方時候，將和艦長本人取得相同的給養。可是，他却沒有知道，他這種公平無私的行動，竟會使這隻小帆船永遠在科學史上出了名；從查理士·達爾文的一生的一系列的科學研究目的方面說來，貝格爾艦就變成了一艘專為他而駛行的練習艦了。

大家時常把他的名字主要去和進化學說結合在一起；在現在這本書裡面，編進了他在旅行期間裡所寫的小型筆記本和他的家信的資料；這時候，正當這個學說的假設還在形成中的最初時期，所以上帝創造萬物和物種不變的正統的教條，仍舊還佔有着明顯的優勢。在這5年的環球旅行期間裡，他追求着自己的一雙沒有經驗的眼睛所遇見到的那些不能明白的地質學的難題，並且進行了大規模的採集動物和植物標本的工作；可是，他在開始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並沒有那個有關物種問

* 這裡的水文學家 (Hydrographer) 應該是貝福特 (Beaufort)。——中譯者註。